

乔治·奥威尔

三十年代小说研究



(1934-1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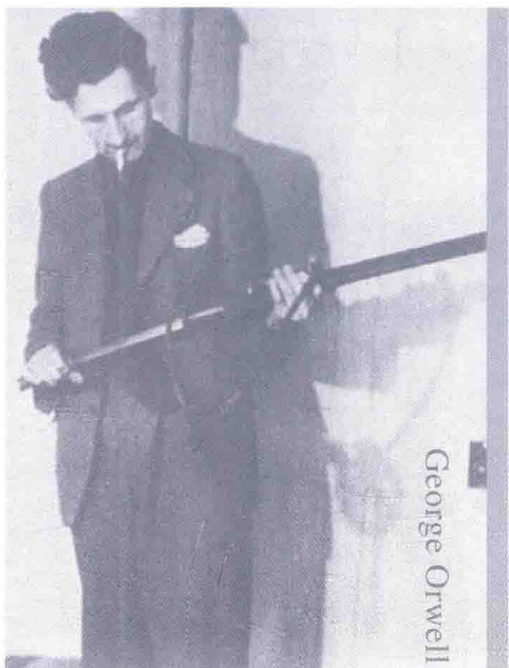
丁卓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乔治·奥威尔

三十年代小说研究

(1934-1939)



George Orwell

丁卓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乔治·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研究：1934 - 1939/丁卓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0

ISBN 978 - 7 - 5203 - 1053 - 6

I. ①乔… II. ①丁… III. ①奥威尔 (Orwell, George 1903 - 1950) — 小说研究 IV. ①I561.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190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202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本书研究乔治·奥威尔在1934年至1939年创作的“三十年代小说”——《缅甸岁月》《牧师的女儿》《让叶兰飘摆》《上来透口气》。这四部小说的知名度虽然不如奥威尔的代表作《动物庄园》《一九八四》那样高，研究资料也较少，却是奥威尔青年时期的主要作品，小说以四个普通小人物为主人公，通过记录他们与不幸命运的抗争过程，体现了现代人内心的焦虑和渴望。这四部小说表面上像四段个人档案，实际上却是奥威尔的“自画像”，奥威尔将自己波折的生活经历融入小说情节，试图从社会环境的制约中，寻找个人精神压抑和生活贫困的原因，将逃离原有环境的控制，追寻自身解放的可能，作为超越自我的方法。在三十年代小说中，主人公通过感受他人所承载的辛酸苦难和融入异质的文化氛围中，获取对新旧价值观作出判断的能力，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总体性把握，以摆脱体制环境的限囿。因此，奥威尔的三十年代小说是其思想观念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本书从奥威尔青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入手，通过分析四部三十年代小说主人公对不幸命运的反抗过程，探究他们追寻自由和幸福的过程和结果，揭示人自由解放的前提是在特定的境遇中对他人的重新发现、理解与关爱。同时，通过对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的解读，尝试为中国的奥威尔研究提供参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奥威尔研究述略	(1)
第一节 国外研究	(2)
第二节 国内研究	(25)
第二章 三十年代小说创作与青年奥威尔	(30)
第三章 白人囚徒的追寻之败	(43)
第一节 种族隔离制度对穷白人的戕害	(43)
第二节 白人囚徒的自我救赎	(50)
第三节 白人囚徒的选择错位	(55)
第四节 与现实对比 追寻怎样的希望	(67)
第四章 对中产者社群的逃离与回归	(71)
第一节 人格逻辑悖论下的失忆和走失	(72)
第二节 在流浪无产者中的倾听与失声	(80)
第三节 在中产者罗网中的进入和挫折	(91)
第四节 在叙述者启导下的认识与回归	(95)
第五章 反抗金钱语码的城市之旅	(106)
第一节 主人公与金钱语码的矛盾对峙	(107)

第二节	金钱语码下的迷茫反抗	(112)
第三节	都市游走与退归独守	(128)
第六章	面向故乡的怀旧和逃离	(138)
第一节	怀旧——摆脱城市生活的精神之旅	(139)
第二节	城市生活的压力与怀旧符号的内涵	(145)
第三节	回归故乡与最后希望	(170)
余论	(177)
参考文献	(180)

第一章 奥威尔研究述略

乔治·奥威尔（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英国作家。他的代表作《动物庄园》（*Animal Farm*, 1945）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 1949），被知识界认为是反抗极权主义和崇尚自由民主的经典，并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其销量远远领先其他同时代英国作家。由于众多学者对《动物庄园》《一九八四》进行了大量研究，加之政治因素和大众传媒推波助澜，欧美学界与文化界逐渐形成“奥威尔热”，尤其是《一九八四》中的“思想警察”“双重思想”“老大哥”“新语”等词语进入大众文化生活，“奥威尔式”成为揭露政治黑幕或极权倾向的标准词汇。奥威尔因其传奇经历和享誉世界的代表作，成为不畏强权和守护真理的文化符号。相较于此，奥威尔在1934年至1939年发表的四部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 1934）、《牧师的女儿》（*A Clergyman's Daughter*, 1935）、《让叶兰飘摆》（*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 1936）、《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 1939），被一些研究者称为“三十年代小说”（thirties'novels, ie Orwell'novels in the 1930s），国内外学术界尚缺少较为系统的研究。三十年代小说是研究奥威尔文学创作方法的基础之一，对厘清奥威尔一生的思想轨迹和作品内涵都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他的三十年代小说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在解读奥威尔的三十年代小说前，有必要梳理国内外研究奥威尔的基本情况，以便为相关论说提供背景依据。

第一节 国外研究

国外知识界对奥威尔的研究资料多，时间长，跨度近70年，英美学者是研究主力。一般认为，奥威尔和同代作家有所不同，“中产阶级作家书写中产阶级的英国，而无产阶级作家关注普罗大众，布鲁姆斯伯里的知识分子向人们宣扬的都是这个团体本身。而奥威尔有跨越阶级、文化、意识形态和文学门派界限的天赋。他是个宽容博采的社会学家，他的作品刻画了现代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因为不属于任何一派而有能力追探整个英国”。^①因此，奥威尔在文学界令人瞩目，又评价不一，比如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其随笔中对奥威尔揭露极权主义的勇气赞赏有加，英国小说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赞赏奥威尔的政治洞察力之深刻，诺曼·梅勒和戴维·洛奇都坦承对奥威尔忠于事实的钦佩，而文学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却一直对奥威尔作品中所描述的恐怖未来不屑一顾，英籍印裔作家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早期曾贬低奥威尔，后来称赞奥威尔脱离精英阶层和殖民主义的勇气，并认为他是“英国历史上最富想象力的人，他是向着新方向前进”。^②尽管褒贬不同，但奥威尔的观念和作品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不容置疑，在奥威尔的传记作家迈耶斯看来，奥威尔的“个人品质——正直、理想主义和执着——在其文字中闪耀着光芒，如同清溪中的卵石。终其一生，奥威尔热切渴望能将不同阶层的人团结起来，并在英国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他这种渴望为他赢得尊敬，也为他戴上了光环”^③，他的小说《动物庄园》《一九八四》已畅销全世界，据迈耶斯统计：“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出版奥威尔作品所赚的利润，是出版其他名家作品加起来的两倍——这些名家包括卡夫卡、纪德、托马斯·曼、斯维沃、

① Jonathan Rose, “Englands His Englands”, in John Rodde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eorge Orwe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6.

② [美]杰弗里·迈耶斯：《奥威尔传》，孙仲旭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450页。

③ 同上书，第7页。

穆齐尔、施瓦茨—巴特、卡尔维诺、川端康成、科莱特和三岛由纪夫等，而他在世界范围内的销量和影响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其他严肃作家都要大。”^① 大众媒体将奥威尔和他的小说塑造成文化符号，他的《动物庄园》《一九八四》被翻拍成动画片、电视剧和电影；《一九八四》中“老大哥”的全方位监控理念，启发了同名电视真人秀的诞生，该节目在欧美社会长盛不衰。

面对复杂的局面，研究者如何梳理出简明的研究线索就显得尤为重要。本书尝试将奥威尔的研究分作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冷战时期，后期是冷战结束至今。贯穿两个时期的线索，是学者们的研究趋向从“政治批评”逐渐转向“文化批评”。这里所说的“政治批评”，是指批评者从党派的意识形态与阶级对立出发，以文本中的政治观念、政治关系与政治行动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解析作家的政治思想为主要研究目的，并相应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批评形态，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或党派原则；而“文化批评”是指批评者从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出发，分析其不幸命运的深层文化动因，不囿于政治领域，而是涉及社会、历史、阶层等“外部因素”，同时也关注文本结构、创作技巧或叙述规律等“内部因素”。在这里无须过多探讨政治或文化，只是意在指出奥威尔研究的基本特点，冷战时期的“政治批评”多以党派斗争为主，而冷战后至今的“文化批评”在弱化意识形态冲突的基础上，突出文化价值观的可选择性，泾渭分明的党性原则退居其次，研究者更重视奥威尔作品本身及其文化内涵，更关注社会上的不公正、不平等状态是如何渗透入公民的日常生活中。但应该注意的是，这两种不同的批评形态只是大致倾向，在前后两个时期中它们有一定的交融性，而且，对奥威尔三十年代小说较为深入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后期。

1. 冷战时期对奥威尔的研究。

冷战前已经有一些不太系统地介绍奥威尔的资料，对他本人较早的品评语句，出自1938年作家康纳利（Cyril Connolly）在其著作中

^① [美] 杰弗里·迈耶斯：《奥威尔传》，孙仲旭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440页。

对奥威尔能深入工厂、矿山和农庄进行社会调查,以获得真知灼见的赞赏:“我只是计划中的叛逆者,而奥威尔是实际上的叛逆者。”^①而最早对奥威尔小说进行评价的文章,是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的夫人奎妮·利维斯(Q. D. Leavis),在1940年9月《细察》(*Scrutiny*)上发表的《体面的文学生命》(*The Literary Life Respectable*, 1940)一文,她在文中认为奥威尔没有写小说的天赋,他写的小说是“干瘪无聊的书”,^②并建议他改当文学评论者。她的观点受到美国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反驳,特里林认为奥威尔的作品体现了“一种毫无遮掩的、直视事物的能力”^③。而普利切特(Victor Sawdon Pritchett)更赞赏奥威尔是“一代英国人的冷峻良心”^④。可见,奥威尔生前所受评价就不一致。

20世纪50年代是奥威尔研究的真正发轫期,“是奥威尔作品传播开来和他个人形象得以树立的关键,并对后世影响深远”^⑤。有英美传记作家为奥威尔作传,比较著名的有劳伦斯·布兰德尔(Laurence Brander)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54)、汤姆·霍普金森(Tom Hopkinson)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56)、克里斯托弗·霍利斯(Christopher Holilis)的《乔治·奥威尔研究:奥威尔和他的作品》(*A Study of George Orwell: Orwell and his works*, 1956)、保罗·波茨(Paul Potts)的《骑自行车的堂吉诃德:追思奥威尔》(*Quixote on a Bicycle: In Memoriam, George Orwell*, 1957)等,这些传记作者几乎都是奥威尔的好友同窗,所以他们对奥威尔的生平记录与思想发展脉络的研究是较为可信的。这个大

① Cyril Connolly, *Enemies of Promis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38, p. 163.

② Q. D. Leavis, “The Literary Life Respectable”, *Scrutiny*, Vol. 9, No. 2, September 1940, p. 176.

③ Lionel Trilling, “Orwell on the Future”, *The New Yorker*, No. 18, June 1949, p. 77.

④ Victor Sawdon Pritchett, “George Orwell”, *New Statesman*, No. 39, January 28, 1950, p. 96.

⑤ Paula Sofia Ramos de Sousa Sampaio, *Reading Literature Today: A Study of E. M. Forster's and George Orwell's Fiction*, Ph. D. Lisboa: Universidade de Lisboa Faculdade de Letras Departamento de Estudos Anglisticos, 2007, p. 40.

量传记一直影响着对奥威尔作品的解读，成为分析奥威尔及其作品内涵的基础，这个特点也延续到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奥威尔逝世后每到他“逢十”诞辰纪念日，其传记和研究著述都大量涌现，而公元1984年更因小说《一九八四》的缘故，怀念性的文章呈井喷式增长，这种景象在文学界并不多见。20世纪50年代传记作家们的努力，使奥威尔及其代表作在资本主义世界迅速走红，他被塑造成抵抗苏联极权制度的“圣徒”形象，《动物庄园》《一九八四》作为“自由启示录”获得西方世界广泛的赞誉。但传记因素其实是外在表象，深层原因是冷战思维与国家力量的介入，以美国、英国为最，它们刻意突出奥威尔小说的政治色彩，展开媒体宣传攻势，从著作发行、影视传播、娱乐消费等层面，将奥威尔政治工具化，将他的小说意识形态化，奥威尔被包装打造成“反共反苏”作家，而对奥威尔进行比较公允评论的文献很少。究其实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利用奥威尔及其作品，从行政体制、经济制度、军事组织和人权意识等方面，攻击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维护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话语权和统治合法性。因此，对奥威尔研究的大量成果始终脱离不开国家利益和政治立场，较多的政治术语使评论文章概念化，进而使对奥威尔的研究几乎成了对奥威尔作品政治影响或冷战功能的论述。

与英美政府及相关文人对奥威尔的利用相比，部分西方左翼评论者因为奥威尔在《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中影射苏联和斯大林，将他视作资产阶级反动作家，如詹姆斯·沃什（James Walsh）认为奥威尔对社会的态度是“歇斯底里的神经质”，“对进步势力采取令人沮丧的仇视态度”，安尼西莫夫（I. Anisimov）指责奥威尔的作品“蔑视人类，意在诋毁”，塞缪尔·西伦（Samuel Sillen）将《一九八四》看作“玩世不恭的一派胡言”，是“反人类的恶意谩骂”^①。而较有研究价值的评论文献是英国左翼作家和评论家约翰·阿特金斯

^① 以上皆转引自 Jeffrey Meyers, *George Orwell: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27.

(John Atkins) 的《乔治·奥威尔：一部文学研究》(*George Orwell, A Literary Study*, 1954)，虽然没有脱离传记的影响，但该书认为，奥威尔的洞察力“来自他的个人经验”，^① 其作品基于“第一手研究资料”(first-hand researches)，^② 研究奥威尔不能将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的生活经历、政治观念割裂开，如果偏据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则成了无源之水，很难具有说服力，奥威尔的文学创作与他的生命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代没有哪个作家能像奥威尔那样深入到乡村和矿区收集资料，在对社会的实际调查中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和创作观，奥威尔最关注的是那些社会上的“失败者”(underdog)，^③ 这是他获得“现代社会圣徒”以及“有良心的知识分子”^④ 荣耀称号的原因。阿特金斯将奥威尔的创作分为若干个主题：反帝国主义、对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的反思、向往社会主义和捍卫自由与人权，他认为奥威尔从根本上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且奥威尔将普通人的生活是否体面，作为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志，这也是“他热爱的英格兰传统价值观”^⑤ 的核心所在，而对普通人威胁最大的就是极权主义制度，阿特金斯进而认为，《动物庄园》就是对此发出的警告，而《一九八四》则因为没有《动物庄园》那样高的前瞻性，成就稍逊一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奥威尔研究的持续发展期。比较有分量的传记作品和文章是奥威尔的妹妹阿芙丽尔·邓恩(Avril Dunn)的《我的哥哥乔治·奥威尔》(*My Brother, George Orwell*, 1961)、英国的理查德·里斯爵士(Richard Rees)的《乔治·奥威尔：胜利营的逃亡者》(*George Orwell: Fugitive from the Camp of Victory*, 1962)、奥威尔的遗孀索尼娅与人合编的《乔治·奥威尔随笔、新闻报道、书信集》(*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1968)和奥登(W. H. Auden)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71)，都尽量贴近奥

① John Atkins, *George Orwell: A Literary Study*, London: John Calder, 1954, p. 69.

② Ibid., p. 123.

③ Ibid., p. 119.

④ Ibid., p. 114.

⑤ Ibid., p. 1.

威尔本人的经历，叙述较为翔实客观，奥威尔逐渐被认为是“一名有见解、有眼力、有使命感的重要小说家”^①。相对于传记，学者们对奥威尔小说的论述更加系统化，并注重将奥威尔从“圣徒”还原为“人”，进行多重意义的挖掘，在他们看来：

乔治·奥威尔或许算是他那个时代最自相矛盾的英国作家了。他本人就是个知识分子，却频频谴责知识界。尽管他对政治持有根本性的恐惧，却又是个一流的政治作家。他是个成功的宣传作家，却又不断告诫读者当心他的偏见。他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持有极为轻蔑的态度，可是又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英国。在其书中，他痛感现代社会的暴虐，自己却在西班牙内战中差点被打死；虽然长年身体不好，他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虽然敏感有加，面对最恶劣的环境，他却毫无怨言。^②

这些观点有助于其他研究者从作家和作品的角度开展研究工作。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乔治·伍德考克和雷蒙德·威廉斯。

受到约翰·阿特金斯的启发，加拿大批评家乔治·伍德考克（George Woodcock）在《水晶之魂》（*The Crystal Spirit*, 1966）中认为，奥威尔的小说“虽然因自恋和对社会主义的不当评价而遭到贬低，但小说的艺术性在总体上未受破坏”，^③从这些小说中，伍德考克发现奥威尔“绝不是一个饱经风霜、死在历经苦难后的苦尽甘来之际的悲情写手，而是一位留下政治遗嘱、警告共产主义噩梦将于未来降临的政治作家”。^④伍德考克总结了奥威尔的形象和意义后，认为他吸引了“右翼中的保守势力和自由市场主义者，极左阵营中的无政

① Peter Stansky and William Abrahams, *Orwell: The Transformation*, London: Granada Publishing Limited, 1979, pp. 108 - 109.

② Richard J. Voorhees, *The Paradox of George Orwell*, Indianapolis: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5.

③ George Woodcock, *The Crystal Spirit: A Study of George Orwell* (with new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 London: Fourth Estate, 1967, p. 104.

④ *Ibid.*, p. 49.

府主义者，走中间道路的社会主义者”。^①而对于知识界，美国《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托派分子和英国“愤怒的青年”都把奥威尔作为偶像，在多重视野下奥威尔被构建成一个复杂的形象，伍德考克认为，一方面，奥威尔的气质单纯又易变，他是“个人主义者，讲义气重节操，不以党派区分他人，也不崇尚空谈”，^②另一方面，奥威尔极为珍视英国传统价值观，天然地反抗不合理的制度，即“把人类规训于‘你不可以……’，个体在某种非自然的状态下生存，当人们被要求‘爱’或‘理性’时，个体就处于持久的压力下，言行整齐划一”^③。奥威尔对这种极权制度的憎恶同时也是对英国传统社会文化理想的追求和守护，这种理想形态倡导先天的公正公平，伍德考克认为奥威尔浸润其中，是位翩翩君子，“面对敌手，即使憎恶万分，他也将其视作人，并以公正待之”。^④因此，伍德考克把奥威尔定义为内心和创作语言如同水晶一般透明坚强的人，而这种品质为其赢得了“自由主义左派”或“左翼自由社会主义者”的称号。

尽管伍德考克的研究立场属于中左翼，但还是不见容于英美左派。康纳·克鲁兹·奥布莱恩(Conor Cruise O'Brien)站在左派批评界的立场，指责奥威尔的政治信仰没有真实性，“对英国左派的信心造成了影响，流毒甚远”，“落伍腐朽的托利党习气萦绕着他”^⑤。亚历克斯·兹沃德林(Alex Zwerdling)认为，奥威尔的作品将历史运动和左派中的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给英国左派事业带来了损害。美国评论者罗伯特·李(Robert A. Lee)更是指出：

奥威尔总是站在他所反对的事物那一面：正统观念和保守意

① George Woodcock, *The Crystal Spirit: A Study of George Orwell* (with new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 London: Fourth Estate, 1984, p. 49.

② Ibid., p. 51.

③ George Woodcock, *The Crystal Spirit*,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7, p. 153.

④ George Woodcock, *The Crystal Spirit: A Study of George Orwell* (with new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 London: Fourth Estate, 1984, p. 51.

⑤ Conor Cruise O'Brien, "Orwell looks at the world" in *the Writers and Politic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5, p. 33.

识，这些比他夸耀的激进主义更为重要，他的精神意义在他的视野中暴露无遗。奥威尔对社会主义者深恶痛绝，并处心积虑地掩盖他对人民的厌烦，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为人民写作本该是奥威尔在写作中反抗体系的一部分。^①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左派批评中最具代表性，从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和苏联侵略匈牙利开始，威廉斯就把奥威尔作为反思大国沙文主义的要素之一，在其《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1958）的最后一章，专门探讨了奥威尔的影响。威廉斯总结了英美三代左派学者——第一代以莱昂内尔·特里林、伊萨克·多伊彻和乔治·伍德考克为代表，第二代包括理查德·霍格特、E. P. 汤姆森和威廉斯自己，第三代人有左派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和杰尼·卡尔登，然后指出，在三代评论者“显而易见的差异中，对奥威尔的关注是共同的兴趣点”^②，即“奥威尔和他所在时代的氛围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隐喻英国新左派发展中的核心特点”。^③ 威廉斯在这里意在揭穿奥威尔对于帝国主义藕断丝连的关系和模棱两可的态度，并以此思考左派的未来命运。威廉斯对奥威尔反帝反殖民的真诚性表示质疑，他要求引奥威尔作品为戒，认为“他的作品可以一读，但读者不能模仿其行事”，^④ 奥威尔小说存在三大缺点：“没有原创性、想象力困乏、讲述能力差。”^⑤ 由于奥威尔与英帝国有撇不清的关系，“奥威尔的危害要远甚于他的政治思想”^⑥。威廉斯认为，尽管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在正义一边，但他仍没有脱离本阶级的局限性，奥威尔的“双重视

① Robert A. Lee, *Orwell Fiction*, Lond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9, p. 25.

② Raymond Williams, *Orwell: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Englewood Cliffs, 1974, p. 5.

③ Ibid., p. 6.

④ Raymond Williams, *Orwell*, Glasgow: Fontana/Collins, 1971, p. 94.

⑤ Raymond Williams, *Orwell in 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 London: NLB, 1979, p. 387.

⑥ Ibid.

野深深地植根于他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地位的模仿”，^① 却“根本没有关注社会现实”，^② 所以在他的小说和纪实文学里，表现了其内心极为消极的一面，在奥威尔那狭隘的经验世界中，没有分清现实和小说虚构之间的关系，人物的生存状况是单向度的，一旦生活条件改善，他的主人公可能随时被生活“招安”，从这些既有反抗精神，又易于动摇妥协的人物身上，威廉斯第一次提出了奥威尔小说人物双重性的问题。正是因为威廉斯看到奥威尔把“现代社会的表现形式和专制统治的强力控制混为一谈，都归结为社会主义”，^③ 所以他要求重新审视奥威尔究竟是个有革命决心的反战社会主义者，还是个守旧落后的顽固“爱国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威廉斯声称自己已经不能卒读奥威尔的作品，奥威尔只是个肤浅的社会主义信徒，所以他预言，奥威尔日后的影响力虽仍能持续，但必会日渐消减。

奥威尔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证明威廉斯的预言错了。撒切尔夫人的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让英国经济回暖，似乎证明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又逢1984年到来，英国举国上下掀起纪念奥威尔的热潮，精神分析学家埃利希·弗罗姆(Erich Fromm)在新版的《一九八四》编后记中认为，奥威尔对极权统治的批判不仅针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同样适用，^④ 这是较早公允地评价奥威尔政治观念的观点之一。面对此情此景，左派不得不对自身研究奥威尔的总体状况进行反思，英国文学批评家克里斯托弗·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的《身陷谜中的奥威尔：来自左派的观点》(*Inside the Myth, Orwell: View from the Left*, 1984)体现了某些新动向：首先，诺里斯指出时代在变化，对奥威尔的研究也应该紧跟时代，在当前的历史社会背景下，学者们应该把关注点放在奥威尔的独立思想与人格上，从这

① Raymond Williams, *Orwell*, Glasgow: Fontana/Collins, 1971, p. 18.

② Ibid., p. 38.

③ Ibid., p. 77.

④ Erich Fromm, *Nineteen Eighty-Four: A Novel*,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1, pp. 266-267.

一点看，奥威尔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而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其次，诺里斯的这本文集进一步从普通人的角度研究奥威尔，认为正是由于其自身的缺点，使他“成为被那些利用他的人的同谋”^①，“奥威尔的形象需要被祛魅，以此来看到意识形态的本质常识，并促进其宣传性更切近地被人所接受”^②。由此，奥威尔开始走下圣坛，不再以圣徒身份出现，人们不断关注他作品中存在的某些思想缺失，英国学者达芙妮·帕塔（Daphne Patai）和英国社会活动家毕翠克斯·坎贝尔（Beatrix Campbell）首开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奥威尔展开批评的先河，她们的研究在英国批评家利内特·亨特（Lynette Hunter）那里得到进一步彰显，她批评奥威尔和他的主人公普遍具有“厌女倾向”（misogyny），而且指出这来自奥威尔本人的矛盾性格与形象：

有的人称他是理性主义者，有的人则称他是感伤主义者；他支持科学，又反对科学；他是客观主义者，也是主观主义者，或者两者都是，所以又成了唯我论者。与之相似的是，时常有人批评他过于抬高个人，时而又有人批评他过于贬低个人；时而有人批评他无视生命的“先决”性，时而又有人批评他相信制度变迁的确定模式。^③

这一观点让人们关注奥威尔观念中的矛盾性，“几乎任何政治类别都能够从他身上找到某些符合它们自身信念的东西，而且颇具说服力”，^④“如果有人仅仅在某一个特定的场合或某一个特定的阶段探究

① Christopher Norris ed., *Inside the Myth: Orwell, Views from the Left*,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4, p. 7.

② Ibid., p. 8.

③ Lynette Hunter, *George Orwell: The Search for a Voic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6.

④ W. F. Bolton, *The Language of 1984: Orwell's English and Ours*,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4, p. 16.